

许春晓, 何玲玲, 张静静. 中国文化遗产民族结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 2021, 41(2): 207-214. [Xu Chunxiao, He Lingling, Zhang Jingjing.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ethnic structure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2): 207-214.] doi: 10.13249/j.cnki.sgs.2021.02.003

中国文化遗产民族结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许春晓, 何玲玲, 张静静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以中国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 获取 1989—2019 年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博物馆的基础数据, 从整体上探究国家级文化遗产所表现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演进, 研究表明: ① 中国民族文化交融化趋势明显, 民族交融文化遗产份额持续上升; ② 中国民族文化平等化趋势明显, 国家级文化遗产已涵盖全部民族,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份额波动上升; ③ 中国民族文化原真化趋势明显, 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分布特征表明在各民族聚居区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得到充分体现; ④ 中国文化遗产所呈现的多元一体民族结构, 受到人口、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 其中, 人口表现出十分稳定的基础性作用, 经济表现出持续弱化的支持性作用, 政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动力性作用。

关键词: 文化遗产; 民族结构; 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 K9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1)02-0207-08

中国拥有 56 个民族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各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单元, 既保持了各民族的鲜明特色, 又“多元聚为一体, 一体容纳多元”, 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各民族文化遗存作为中华文脉的历史基因, 一直都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将各民族文化遗存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 将文化认同作为民族团结的根脉, 铸造文化自信的根基。党的“十九大”后, 中国全面进入新时代, 各民族团结进步速度加快,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结构的全面认知, 成为重要课题。中国文化遗产民族结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是基础性问题, 亟待深入研究。

文化遗产的学术话题已逐渐形成体系, 在文化遗产内涵^[1-4]与分类^[5]、价值及其评估方法^[6-8]、保护^[9-12]和利用^[13,14]等方面, 理论与实践结合, 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中国研究水平也已快速接近国际先进, 并将文化遗产密切关联美丽中国^[15]、乡村振兴^[16]、精准扶贫^[17]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议题, 逐渐形成了特色领域。细观国内外文化遗产的研究, 以文化遗产的类别为对象, 在各类具体文化现象的

细致探究上, 成果丰硕。从宏观上全面探究文化遗产系统性问题, 则有明显的缺陷, 国际尺度主要以世界遗产名录为依据, 探究空间分布问题; 国别尺度, 特别是中国, 主要以国家级文化遗产名录为依据, 各种类别的文化遗产专门研究成果居多。从整体视角, 系统探索文化遗产问题的研究成果, 未见报道。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民族文化的创新交融, 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史表现的事实逻辑, 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客观表现。中华民族文化遗产, 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全面建构科学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格局,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的重要工作。细致思辨各类文化遗产类别属性, 梳理国家级文化遗产的保护载体及其基本单元, 从整体上探究其民族结构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优化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理论依据, 为推进各民族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提供政策依据, 意义重大。

收稿日期: 2020-04-02; **修订日期:** 2020-06-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7)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971187).]

作者简介: 许春晓(1962-), 男, 湖南新化人, 博士, 教授, 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开发。E-mail: chunxiao2682@163.com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国文化遗产民族结构及其演进有良好的解释意义：① 多元一体格局中，56 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② 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由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其中，汉族起着凝聚核心作用；③ 不同层次认同可以并存不悖，在不同层次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18]。各民族文化共存与相互尊重是多元一体格局中内在的秩序规则^[19]。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可以在共存共荣的秩序规则下多元发展，在交融凝聚秩序规则下融合发展，在完整保护的规则下原生分布。

经济、社会和政治在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推动不同文化的交融^[18]。政策作为多元一体的具体属性体现^[20]，和经济的开放性发展，对文化多样性格局产生影响^[21]。同时，人口作为社会文化的创造主体^[22]，影响着文化的产生、交流和发展。一般而言，在人口密集、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更容易创造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23]。

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结构演进的研究框架(图 1)：首先，在梳理文化遗产概念的基础上，确定研究对象，获得可靠的研究数据；其次，确定文化遗产的凝聚化水平、多元化水平、完整性水平特征的测定方案，揭示演进特征；最后，选取影响中国文化遗产民族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的代表性指标，揭示其影响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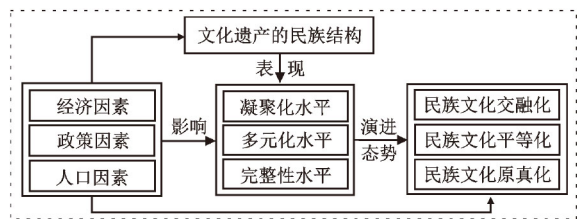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Fig.1 The research framework

1.2 研究对象的思辨与确定

遗产通常是指过去的物品、地点和其他多种形式的财产。文化遗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跨学科概念，有从客体中心主义向功能主义演进的倾向^[1]。

梳理文化遗产内涵和外延的演变历程，1954 年前，文化遗产观念大致接近历史纪念物；1954 年《海牙公约》(<http://www.tlf.gov.cn/info/6155/82074.htm>)首次使用“文化财产”，将对于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财产、保存或展览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建筑物、容纳大量文化财产的纪念物中心纳入文化财产的范畴；1972 年《世界遗产公约》(<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whc.shtml>)提出文化遗产包含文物、建筑群、遗址，并对每一类别的文化遗产进行说明，强调文化遗产是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财产；2005 年《文化遗产社会价值框架公约》(<https://rm.coe.int/1680083746>)将人和人类价值纳入到文化遗产中，认为文化遗产是人们从过去继承的、经人们认定、所有权独立的一系列资源，是人们不断发展的价值观、信仰、知识、传统的反映和表达。

文化遗产的内涵在遗产保护观念的不断发展中演变。1972 年《世界遗产公约》(<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whc.shtml>)明确文化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的工作；1987 年，由于中国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泰山既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又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概念开始出现；1992 年，自然与文化有机结合的英国湖区 2 次申请世界遗产失败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视和反思，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概念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中；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回应部分成员国要求拟定有关民间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准，宣布“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在遗产保护的实践中与时俱进。由“文化财产”演变为“文化遗产”，又发展了“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概念，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不断扩展，不仅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依据，还引起了学界对文化遗产内涵的广泛讨论。文化遗产作为“认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文化性、代际传承性和价值性，是文化物、文化遗物、文化财产三重身份的统一^[2]。在遗产保护的实践中，社会通过某种价值体系从历史记录中选择遗产并予以传承和保护，这种价值体系是当代文化的产物，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会有不同的视野^[3]，具体表现在文化遗产

的选择标准从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向身份价值、与记忆互动的价值扩展,选择的基础从物质文化遗产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选择的类型从以单体为主的传统遗产向地域综合体扩展^[4]。

为系统地揭示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结构,结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从 3 个维度确定具体研究单元。① 层次性,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国家级的文化遗产。② 系统性,全面覆盖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了其扩展项目;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国家级文物包含可移动和不可移动两大类,又分为国家级藏品和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2 种保护方式,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集中分布的行政单元又冠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国家级藏品几乎都属于可移动文物,截至 2017 年,中国有国家级藏品 4 396 079 件,其中一级藏品 100 650 件,二级藏品 746 846 件,三级藏品 3 548 583 件,集中收藏于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中,EPS 全球统计相关数据显示近 90% 的国家级藏品由博物馆集中保护,国家级博物馆是国家级藏品的集中收藏保护单位;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是对文物单体采取就地保护、属地管理的基本空间单元,整体上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但也包含文化渊源密切的可移动文物。③ 可衡量性,既充分考虑可识别性又严格遵循不重复性,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选择国家级藏品的集中收藏单位国家级博物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传承人所在地或者申报单位所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是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分布的地域综合体,包含了已定研究对象;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是大量国家级文化遗产单元的集聚地,包含了已定研究对象;均不重复在研究对象中表达。因此,将国家级博物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扩展项目的传承人(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可以科学揭示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结构演进。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选择权威部门公布的信息作为研究数据,收集整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公布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一共 8 批 5 058 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官网(<http://www.ihchina.cn/>)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扩展项目 4 批 3 135 项、国家文物局官网(<http://www.ncha.gov.cn/>)公布的国家级博物馆 972 家,包含各项文化遗产的详细地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申报单位等信息(未含港澳台数据)。

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属性具有 2 类情况,一类是单一民族属性的文化遗产,共 56 种文化遗产属性;另一类是 2 个或 2 个以上民族文化交融的文化遗产,反映着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成果;由此可以确定中国文化遗产具有 57 种民族属性。在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文物的民族属性确定工作中,充分考虑春秋战国是中国各民族迅速发展的阶段^[24],本研究仅选择春秋战国及其之后的 4 529 项文物类文化遗产为素材,判定民族属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属性,根据其传承人的民族归属确定。

充分考虑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级博物馆的保护名录的确定批次并不同时,1989 年之前公布的国家级文化遗产数量较少,选择 1989 年作为基准年份,以 10 a 为一个时间节点考察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结构演进。

1.4 主要指标及其测度

1) 国家级文化遗产的民族覆盖度,即国家级文化遗产涵盖的民族数量占全部民族的份额,是国家级文化遗产民族结构多元化的重要表现。

2) 民族文化遗产分布广度,即各民族国家级文化遗产在各省份分布的广度,是考察各民族人口分布特征与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对应性的有效指标。

$$D_i = 1 - \sum P_{ij}^2 \quad (1)$$

式中, D_i 为 i 民族文化遗产的分布广度, D_i 值越大,说明 i 民族文化遗产在各省份分布广泛程度越高; P_{ij} 为来自 i 民族 j 省份的国家级文化遗产在 i 民族所有文化遗产中的占比。

3) 经济保障力度,以省级行政区为地域单元,以其经济能力对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对应状况,测度经济因素的作用强度(公式 2)。以省级行政区的 GDP 总值与该省级行政区特定民族文化遗产产量占全国该民族文化遗产总量的份额的乘积。

$$C_i = \sum GDP_j \times (n_{ij}/N_i) \quad (2)$$

式中, C_i 是 i 民族文化遗产经济保障力度; GDP_j 是 j 省份的 GDP 总值; N_i 是 i 民族文化遗产总量; n_{ij} 是 i 民族在 j 省份分布的文化遗产数量。

4) 政策支持力度, 以省级行政区为地域单元, 以其政策权威性对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对应状况, 测度政策因素的作用强度。具体测度方案为, 分别以“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物”为关键词, 在“北大法宝”逐条查阅内容, 筛选出有关文化遗产的政策, 参考唐晓云^[25]政策法规的量化方法, 将国家法律赋值为 5 分, 国家行政法规赋值为 4 分, 国务院行政规范性文件赋值为 3 分, 部门规章赋值为 2 分, 部门行政规范文件赋值为 1 分, 同时考虑特定省级行政区颁布的政策法规的支持作用, 将地方性法规赋值为 4 分, 地方政府规章赋值为 3 分, 地方规范性文件赋值为 2 分, 地方工作文件赋值为 1 分。

$$P_i = \sum S_j \times (n_{ij}/N_i) \quad (3)$$

式中, P_i 是对 i 民族文化遗产政策支持力度; S_j 是 j 省份文化遗产政策总得分, 由中央政策得分和 j 省政策得分相加得到。

2 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结构演进特征

2.1 各类民族属性文化遗产份额演进总特征

借助 Excel 分析工具, 利用 1989—2019 年中国文化遗产数据计算汉族文化遗产、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交融文化遗产占有所有文化遗产的份额发现: 汉族文化遗产份额从 55.27% 下降到 47.36%;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份额从 13.76% 波动上升到 17.75%; 民族交融文化遗产份额从 30.97% 持续上升到 34.89%。

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民族属性看, 汉族文物保护单位占比较大, 民族交融文物保护单位次之, 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单位占比较小。动态考察发现, 汉族文物保护单位份额从 55.27% 下降到 44.27%; 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单位份额从 13.76% 下降到 11.35%; 民族交融文物保护单位份额从 30.97% 持续上升到 44.38%, 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时期形成的以物质为载体的综合性文化遗产, 其民族交融份额的明显上升反映了历史时期客观存在大量的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事实。

从国家级博物馆的民族属性看, 民族交融属

性的国家级博物馆单位成为绝对优势。动态考察发现, 民族交融属性国家级博物馆份额从 92.62% 上升到 94.44%。国家级博物馆是可移动文物的主要收藏单元, 多数位于中心城市, 汇集着一定区域各民族的国宝级文物, 这种可移动文物的集中保护方式, 使得国家级博物馆绝大多数具有民族交融属性, 在国家级博物馆集中展示各民族的可移动优秀物质遗存, 也是民族平等性的体现。

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属性看, 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比较大,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次之, 民族交融文化遗产占比较小。动态考察发现, 汉族文化遗产份额从 64.83% 下降到 64.78%;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份额从 32.72% 下降到 32.50%; 民族交融文化遗产份额从 2.46% 上升到 2.7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时期形成的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 其份额和中国的民族人口结构密切相关, 民族交融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份额的上升明显反映了历史上各族人民在民间音乐、艺术、舞蹈等方面的互鉴融通。

2.2 不同民族文化遗产数量和份额的演进特征

考察国家级博物馆的民族属性发现, 除专为纪念某位人物设立的, 如鲁迅纪念馆等, 属于汉族国家级博物馆。绝大多数国家级博物馆是多个民族可移动文物的集中收藏和展示单位, 属于民族交融文化遗产, 所表现的交融化趋势明显。

具体考察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属性。从文化遗产民族覆盖度看, 文化遗产的民族结构多元化趋势十分明显。1989 年以前, 涵盖 17 个民族, 民族覆盖度为 0.30; 1989—1999 年新增朝鲜族、羌族和土族文化遗产, 民族覆盖度 0.36; 1999—2009 年新增阿昌族、保安族、布朗族、德昂族、东乡族、独龙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高山族、哈尼族、赫哲族、基诺族、京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拉祜族、黎族、傈僳族、珞巴族、毛南族、苗族、仫佬族、纳西族、怒族、普米族、撒拉族、水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佤族、乌孜别克族、瑶族、仡佬族、裕固族, 民族覆盖度 0.98; 2009—2019 年新增门巴族, 涵盖所有民族, 民族覆盖度为 1。从不同民族属性的文化遗产的份额看, 表现出均衡化趋势。截至 1989 年, 份额位列后 10 的仡佬族、怒族、保安族、独龙族、高山族、基诺族、景颇族、门巴族、普米族、塔塔尔族的文化遗产总份额为 0; 至 2009 年, 仡佬族份额上升至 0.05%, 怒族、

保安族、独龙族、高山族、基诺族、景颇族、门巴族、普米族、塔塔尔族份额均上升至 0.02%; 至 2019 年, 佤族份额为 0.03%, 怒族、保安族、独龙族、高山族、基诺族、景颇族、门巴族、普米族、塔塔尔族份额均为 0.01%。

1989—2019 年, 文化遗产覆盖的民族数量演进表现的多元化, 各民族文化遗产份额变化表现的均衡化, 使民族文化平等化越来越凸显。

2.3 不同民族属性文化遗产的分布演进特征

考察不同民族属性的文化遗产的分布广度发现, 总体上, 不同民族属性的文化遗产分布广度指数趋于提高, 分布的广泛水平提升。截至 1989 年, 民族交融、汉族、回族、满族、锡伯族、瑶族、藏族、土家族、达斡尔族、侗族的文化遗产分布广度指数位列前 10, 平均分布广度指数为 0.52; 至 1999 年, 位列前 10 的平均分布广度指数升至 0.54; 至 2009 年, 位列前 10 的平均分布广度指数升至 0.74; 至 2019 年, 位列前 10 的平均分布广度指数升至 0.76。1989—2019 年, 佤族、怒族、保安族、独龙族、高山族、基诺族、景颇族、门巴族、普米族、塔塔尔族的分布广度指数一直位列后 10, 集中分布在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文化遗产空间上的分布状态, 和中国少数民族的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空间格局密切相关, 反映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孕育的独特地域空间特征。其动态特征和中国各民族历史上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交流的特征相呼应, 同时也体现了政府高度重视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原真性保护和传承。

3 文化遗产民族结构演进影响因素

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各民族文化遗产经济保障力度、政策支持力度及其人口在各民族文化遺產传承与保护中的作用。从时间截面看, 至 1989 年, 人口与文化遗产规模相关性系数为 0.99, 经济的相关性系数为 0.55, 政策的相关性系数为 0.32; 至 1999 年, 人口与文化遗产规模相关性系数稳定在 0.99, 经济的相关性系数下降为 0.48, 政策的相关性系数下降为 0.30; 至 2009 年, 人口与文化遗产规模相关性系数稳定在 0.99, 经济的相关性系数下降为 0.45, 政策的相关性稳定在 0.30; 至 2019 年, 人口与文化遗产规模相关性系数稳定在 0.99, 经济的相关性系数稳定在 0.45, 政策的相关性上升为 0.54。整体上, 人口与文化遗产规模相关水平

最高, 表现出十分稳定的基础性作用; 经济与文化遗产规模相关水平较高, 表现出支持性作用, 但是存在持续弱化的态势。政策与文化遗产相关水平在 1989、1999、2009 年 3 个时间截面上表现较稳定, 表现出动力性作用, 在 2019 年出现显著变化, 相关水平超出经济因素。

3.1 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是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支撑。建国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不断腾飞, 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保障, 经济保障力度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规模息息相关, 相关系数处于 0.45~0.55 的持续弱化态势, 经济发展水平对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小。在贵州、青海、新疆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少数民族集聚区, 其文化遗产份额以较快的速度增加, 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整体份额从 1989 年的 13.76% 波动上升至 2019 年的 17.75%, 地方经济和各民族文化遺產规模的关联性趋于弱化。

3.2 政策因素

政策支持是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重要动力之一。政策因素与文化遗产规模相关明显, 相关系数处在 0.30~0.54, 2019 年表现出了长期徘徊后的聚升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10/content_4246.htm)明确规定要保护名胜古迹及历史文物;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http://www.gov.cn/gongbao/shuju/1982/gwyb198219.pdf>)颁布, 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收藏文物单位纳入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政策开始体系化。到 1989 年, 中国已公布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共 3 批 500 处, 政策支持力度与文化遗产规模的相关性系数为 0.32。

1990—1999 年, 中国对各类文物管理工作出台规范性文件: 1991 年《关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https://www.pkulaw.com/chl/f0ab24d42f57b3fbbdfb.html?keyword>)、1995 年《近现代体育文物征集管理办法》(<https://www.pkulaw.com/chl/9c61e78b96a0f37ebdfb.html?keyword>)等。到 1999

年,中国已公布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共4批750处,政策支持力度与文化遗产规模的相关性系数为0.30。

2000—2009年,2005年《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926.htm)公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指出要重点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9年《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http://www.gov.cn/test/2009-08/13/content_1390565.htm)指出,要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开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调查登记工作,对濒危少数民族重要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官网(<http://www.ihchina.cn/>)、国家文物局(<http://www.ncha.gov.cn/>)公布的信息,整理得到2009年,中国已公布全国文物保护单位6批2352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扩展项目2批2118项,国家级博物馆542家,政策支持力度与文化遗产规模的相关性系数为0.30。

2010—2019年,各项政策法规的颁布让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越来越完善。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纷纷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2012年《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通知》(http://www.gov.cn/zwggk/2012-10/15/content_2244022.htm)发布,辽宁、重庆、广东等纷纷制定关于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地方性政策,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作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策部署以来,国家文物局和各地方政府响应号召,出台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同时各级各项政策法规落实的叠加效果和累进效果不断凸显,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官网(<http://www.ihchina.cn/>)、国家文物局(<http://www.ncha.gov.cn/>)公布的信息,计算整理到2019年,中国已公布全国文物保护单位8批5058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扩展项目4批3135项,国家级博物馆972家,政策支持力度与文化遗产规模相关水平显著提高到0.54。

3.3 人口因素

人口规模是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基础。人口规模与文化遗产规模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一直处在0.99的高位。细观具体情况,中国文化遗产份额位居前10的汉族、藏族、蒙古族、满族、苗族、维吾尔族、回族、彝族、土家族的民族人口数量都在30万以上特别要指出的是,人口也并不是影响各民族文化遗产民族结构的唯一决定因素,如壮族、布依族、哈萨克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水族、拉祜族、佤族、东乡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虽然人口份额有所下降,但文化遗产规模仍在扩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989—2019年,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结构的演进表现出多元一体格局: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平等化趋势。汉族文化遗产份额下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份额波动上升。国家级文化遗产民族覆盖度由1989年的0.30,至1999年的0.36,至2009年的0.98,至2019年,达到1,完成全覆盖。1989—2019年,文化遗产份额位居后10的仫佬族、怒族、保安族、独龙族、高山族、基诺族、景颇族、门巴族、普米族、塔塔尔族的文化遗产份额波动上升,民族结构多元化趋势十分明显。②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原真化趋势。1989—2019年,各民族文化遗产在各省份的分布广度指数趋于提高,分布越来越分散,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分布在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而且越来越广泛地分布在其他省份。③文化遗产保护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交融化趋势。民族交融文化遗产份额持续上升,不断向多元一体的结构演进。且各民族文化互鉴,表现出多元交融色彩,其中汉族是凝聚的核心力量。

中国文化遗产所呈现的多元一体民族结构,受到经济、人口、政策因素的明显影响。其中,各民族人口规模对文化遗产民族结构及其演变起着基础性作用,关联水平处于0.99的高位。经济保障力度起着支撑性作用,关联水平稳定在0.45~0.55的持续弱化态势;政策支持力度的关联水平在1989、1999、2009年3个时间截面上表现较稳定,在2019年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大量支持性政策,对文化遗产民族结构的优化起了重要作用。

4.2 讨论

中国文化遗产民族结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工作的主要贡献是, 尝试着将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整合为具有可比性的考察单元, 从整体上探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工作存在 2 个局限: ① 在研究对象选择过程中, 部分图书馆、档案馆收藏了可移动国家级文物, 特别是典藏古籍、历史文献原件等, 同时部分非国家级博物馆也收藏了一定量的国家级文物, 也未纳入研究范畴; ② 在测算各民族文化遗产所在地经济环境得分时, 未将政府和社会各界为各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设立的专门经费项目纳入考虑范畴。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进一步研究中, 如何全面而科学地确定文化遗产的考究单元, 如何体系化、精准化考量政策、经济各类因素的作用性质和强度, 是学术攻关的难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Loulanski T. Revising the concept for cultural heritage: The argument for a functional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2006, 13(2): 207-233.
- [2] 晁舸, 王建新. 逻辑语境下的文化遗产概念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4(3): 38-44. [Chao Ge, Wang Jianxin. A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context of logic.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44(3): 38-44.]
- [3] 黄明玉. 文化遗产概念与价值的表述——兼论我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问题[J]. *敦煌研究*, 2015(3): 134-140. [Huang Mingyu. Cultural heritage: Concepts and expression of values plus related issues in P. R. C. Law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Dunhuang Research*, 2015(3): 134-140.]
- [4] Vecco M. A defini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tangible to the intangible[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10, 11(3): 321-324.
- [5] 曾熙, 谭旭, 王晓光. 文化遗产大数据二维分类框架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 2020(1): 84-93. [Zeng Xi, Tan Xu, Wang Xiaoguang. Two-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for cultural heritage big data.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20(1): 84-93.]
- [6] Tengberg A, Fredholm S, Eliasson I et al.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d by landscapes: Assessment of heritage values and identity[J]. *Ecosystem Services*, 2012, 2(2): 14-26.
- [7] Choi A S, Ritchie B W, Papandrea F et al. Economic valu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choice modeling approa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2): 213-220.
- [8] 任唤麟. 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类旅游资源价值评价——以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国段为例[J]. *地理科学*, 2017, 37(10): 1560-1568. [Ren Huanlin. On value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 of cross-regional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routes network of Chang'an-Tianshan corridor in China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10): 1560-1568.]
- [9] Sutter G, Sperlich T, Worts D et al. Fostering cultures of sustainability through community-engaged museums: The history and re-emergence of ecomuseums in Canada and the USA[J]. *Sustainability*, 2016, 8(12): 1310.
- [10] V M Kimeev. Ecomuseums in Siberia as centers for ethn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J].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08, 35(3): 119-128.
- [11] 张世威. 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研究——来自土家摆手舞的田野释义与演证[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 38(8): 20-28. [Zhang Shiwei. Protec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pace theory: Field interpre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Tujia Waving Dance. *Journal of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2015, 38(8): 20-28.]
- [12] Owley J.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easements: Heritage protection with property law tools[J]. *Land Use Policy*, 2015, 49(49): 177-182.
- [13] 张建忠, 温娟娟, 刘家明, 等.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J]. *地理科学*, 2017, 37(7): 1104-1111. [Zhang Jianzhong, Wen Juanjuan, Liu Jiaming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ourism respons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hanxi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7): 1104-1111.]
- [14] Park H Y. Shared national memory as intangible heritage: Re-imagining two Koreas as one n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2): 520-539.
- [15] 刘小方. “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区域世界遗产战略建构——以西藏自治区为例[J]. *西藏研究*, 2013(4): 57-64. [Liu Xiaofang. Regional world heritage strategy form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autiful China”: Case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ibetan Studies*, 2013(4): 57-64.]
- [16] 陶伟, 蔡浩辉, 廖健豪. 粮食地理学视角下乡村本土农业的社会建构——元阳哈尼梯田稻作系统案例[J]. *地理科学*, 2020, 40(4): 637-645. [Tao Wei, Cai Haohui, Liao Jianhao. Social construction of local agri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o-food geography: A case study of Hani Rice Terraces System.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637-645.]
- [17] 桂胜, 孙仲勇, 李向振. 文化空间再造与少数民族“非遗扶贫”的路径探析——基于鄂西恩施市的田野考察[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40(1): 29-35. [Gui Sheng, Sun Zhongyong, Li Xiangzhen.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pace and the path of helping the poor b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r ethnic minorities.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40(1): 29-35.]
- [18]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4): 3-21. [Fei Xiaotong. The pluralistic integ-

- ratio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989(4): 3-21.]
- [19] 许宪隆, 袁年兴.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与各民族的共生互补——兼论“第二代民族政策”[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2(5): 13-19. [Xu Xianlong, Yuan Nianxing. The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symbiosis and complementarity of all ethnic groups—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national policy”.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32(5): 13-19.]
- [20] 王希恩. 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多元一体主义的思考[J]. *世界民族*, 2013(5): 1-5. [Wang Xien. From multiculturalism to unity with diversity. *Journal of World Peoples Studies*, 2013(5): 1-5.]
- [21] 沈园, 毛舒欣, 邱莎, 等. 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时空格局[J]. *生态学报*, 2018, 38(21): 7596-7606. [Shen Yuan, Mao Shuxin, Qiu Sha et al.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Southwest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8, 38(21): 7596-7606.]
- [22] 杨秀莲. 试论人的文化存在方式[J]. *学术交流*, 2011(11): 1-4. [Yang Xiulian. On the way of human cultural existence. *Academic Exchange*, 2011(11): 1-4.]
- [23] 陈晨, 修春亮, 陈伟, 等. 基于GIS的北京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J]. *地理科学*, 2014, 34(4): 420-429. [Chen Chen, Xiu Chunliang, Chen Wei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name landscape based on GIS approach in Beijing and its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4): 420-429.]
- [24] 杜国林.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和民族关系[J]. *思想战线*, 1986(6): 72-79. [Du Guol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thnic and ethnic group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deological Fronts*, 1986(6): 72-79.]
- [25] 唐晓云. 中国旅游发展政策的历史演进(1949-2013)——一个量化研究的视角[J]. *旅游学刊*, 2014, 29(8): 15-27. [Tang Xiaoyu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ourism development policies (1949-2013): A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Tourism Tribune*, 2014, 29(8): 15-27.]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Ethnic Structure in China

Xu Chunxiao, He Lingling, Zhang Jingjing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Abstract: Taking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basic data of majo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es protect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ational museums are obtained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ethnic structure in Chinese mainl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equality trend of ethnic groups' cultur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is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has covered all ethnic groups with a national coverage of 1 by 201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hare of cultural heritage owned by various ethnic groups, the share of the minority's cultural heritage fluctuates; 2) The authenticity of ethnic groups' culture in our country is getting more obviou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show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cultural heritage is fully reflected in the areas where ethnic groups live together; 3) The share of national amalgamation cultural heritage rising continuously shows that the trend of national culture amalgamation is obvious.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teracted and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showing a diverse blend of colors in the process, of which the Han nationality is the core force of cohesion; 4) The cultural heritage ethnic structure in Chinese mainland is obviously affected by population, economic, and policy factors. The population scale of each ethnic group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while economy is the guarantee factor for the heritage protection of each ethnic group's cultural heritage. Policy is the support factor. A large number of supportive policies was issu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thnic structure of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cultural heritage; ethnic structure; pluralistic integration